

◎文学聚焦

抗疫报告文学： 书写大爱 礼赞英雄

张 陵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涌现出的伟大的抗疫精神，被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并热情地表现出来了。报告文学作家李朝全、纪红建、李春雷、曾散、普玄、张培忠、许峰等人深入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一线，在细致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迅速写出一大批作

品，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真实报告了疫情情况，写下全国人民尤其是湖北人民抗疫斗争的感人事迹，塑造了由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医疗队、部队医护人员和许许多多抗疫一线的普通人、志愿者共同组成的英雄群像。

记录“逆行者”的身影

疫情发生的时候，人们的悲伤恐惧脆弱绝望是正常的。新冠病毒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似乎无所不在，这自然增加了人们的不安感。然而就有这样一批“逆行者”冲到了最危险的第一线，担当起抗击病魔、救助生命的重任。他们的生命也很脆弱，可他们还是挺身而出，搭建起一艘艘生命的方舟，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希望。他们就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外省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前来援助的解放军医护人员，还有坚守岗位的大批志愿者。报告文学作家被这种精神所感动，记录下“逆行者”们在这个艰难时刻的日日夜夜。

张培忠、许峰的《千里驰援》是最早反映抗疫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作家通过对广东支援武汉医疗队的生动描写，表现了医护工作者的“仁者”情怀和救死扶伤的精神。作品突出描写的钟南山院士的形象感人至深。虽然我们早已知道钟南山对抗击疫情的重要贡献，但从文学形象身上，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精神品格。他们身上，凝聚着我们战胜病魔的坚强意志、科学力量和永不言败的精神。纪红建是最早进入武汉采访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不长的时间里，他已经完成了多篇作品，讲述普通人在抗疫一线的故事。《生命之舱》写出了方舱医院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写出了一个个医护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风貌。《武汉的“转运兵”》则把视线转向武汉的公安干警。人们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医院，看到病人的危险和医生的工作，可能很少注意到这座城市的病人不少是由公安干警送到医院的。他们在特殊时期承担起特殊的任务。李朝全的《“同济”战疫记》是一篇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抗击斗争的全景式记录，全院各科室的医护人员在完成基本培训后，都参加到抗疫一线的战斗中。他们有的身在外地、有的新婚不久、有的孩子正小，却没有一个人后退或者逃离，舍小家为



《逆行者》 陈 娜绘

图片来自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

大家，表现出了崇高的医者情怀。

塑造新时代青年形象

不少“80后”“90后”甚至“00”后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的青春之花。报告文学作家将目光聚焦在这批青年身上，用文字塑造出新时代青年形象，谱写出一曲青春之歌。

纪红建的《春天的声音》写青年志愿者陶梦婷。她做了许多志愿者应该做的事情，但人们印象更深的是她甜美的声音。她把美好心愿传递给群众，也让自己的声音变成了春之声。这篇报告文学短小精美，写出了一代青年的风采。何建明的《接力“妈妈”》写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医护人员接收救治新冠肺炎患儿的温暖故事。24岁的张洁、22岁的王锦等年轻护士都没有育儿经验，面对幼小调皮的宝宝，她们又多

了一重临时妈妈的身份。尽管面临挑战，但慈爱的母性和白衣天使的职责让她们迅速成长并适应了新角色。在医生的治疗和接力“妈妈”的悉心照料下，患儿们一个个康复出院了，临时妈妈们也收获了爱与成长。李朝全的《一位叫“大连”的志愿者》写的是一位青年志愿者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小强本是一个过路者，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他滞留于武汉，他还成了一名医院护工。他目睹了疫情中普通人的生与死。这个28岁的青年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生。他和普通人一样感到害怕，但他终于战胜自己，干起了疫情期间风险极大又异常辛苦的服务工作。作品写出一个人把苦难变为人生成长动力的过程。李春雷的《三月正青春》写河北支援武汉医疗队护士肖孟孟的故事，是一篇用心之作。一个朴实的护士，做着普通的工作，从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人们称作英雄。但是，关键时刻，她把爱无私地给了患者，彰显出人间大爱。这就足以

被我们敬重，足以被称为英雄。曾散的《甘心》没有把更多的笔墨用在直接书写抗疫过程上，而是写青年医生甘如意千方百计赶回武汉参加抗疫斗争的故事。甘如意明知危险却冲向危险的高尚品格和她对这座城市深沉的爱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坚定为人民书写的立场

这些走向抗疫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严峻现实的局外人。他们自己所处的城市，也是中国抗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都身心疲惫地经受着疫情考验，也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然而，他们到一线后，看到的是那些勇敢前行的人们，看到的是与病魔的斗争，看到的是奉献与牺牲。他们笔下的人物，是普通人，有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有生活的困扰，甚至有命运的不幸。可是他们却在斗争中显现出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本色与品格。通过这些人物，报告文学弘扬了社会正能量，给人以信心、给人以思考、给人以力量。

从中可以看出，报告文学作家的立场是自己的，又是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在严密防控疫情的日子里，人们更需要的是真情实感、有精气神、能凝心聚力的文字，报告文学自觉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抗疫过程中时时刻刻涌现出的动人故事，报告文学有义务有责任把它们掏出来、讲出来、存下来。这样的现实纪录，是具有历史价值的。

作为文学的轻骑兵和侦察兵，报告文学对抗疫斗争的记录，不仅记下了历史事实，更留下抗疫过程中涌现出的人间大爱和高尚情怀，这不仅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的精神力量，也承担着抚慰人心的功能。疫情过后，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的过程中可能还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抗疫报告文学应持续关注对此进行关注，将文学传递出的社会正能量转化为人们砥砺前行、为美好生活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

◎新作评介

生活中长出“爱的颂歌”

——读《美顺与长生》

朱 婧

《美顺与长生》出版后，作者毛建军朝阳医院推氧气瓶工人的身份被大众传媒不断强调。固然，普通工人写出一部审美上经得起专业考量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新闻事件，但文学研究可能更关心的是，这部专业读者说好、普通读者感动的小说，究竟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毛建军曾说过：“当我在纸上写下第一句‘那一年，美顺16岁’时，我眼泪就下来了。”小说《美顺与长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顺传”。而且，毋庸讳言的是，毛建军和他的妻子张华的“私人生活”是这部小说最初生长的种子——情感和精神的核。但不能据此将《美顺与长生》看作一部自叙传，小说其实是张华与张华命运相同的人而写，这使得这部小说有着它无穷的远方和人们，有着当下小说所匮乏的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共同命运感。

爱、尊重、休戚与共是《美顺与长生》的内核，这使得这部小说即使是在大的世情小说谱系中，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它对世俗人情的表现不是旁观者的审视、甚至不是理解和同情，而是活在焉、写在焉。所以有人说，《美顺与长生》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如何理解“从生活中生长出来”？世情文学的一个庞大分支已经转移到影视和网络中的家庭剧上，在这种情况下，世情小说的意义和存在的空间在哪里？《美顺与长生》给出了答案。小说中故事通“俗”，但却不缩身家庭关系连环矛盾冲突下的近身肉搏。热门家庭剧热衷关注的房产矛盾、婆媳问题等，小说虽然亦有所涉，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质感。在这种意义上，通“俗”的《美顺

与长生》有着审美意义的脱“俗”，而这正缘于作品质朴纯真的底子。

小说作者和叙事者的隐秘关联，可以是叙事立场、位置和声音等等，现实世界中的人、写作时刻的作者和最后出场的叙述者之间以何种秘密的方式进行着生命的密码和能量的交换，往往决定小说最终的形貌和气质。《美顺与长生》和多年前号称“素人”作品的长篇小说《山楂树之恋》类似，粗略观之，都脱离炫技，具有生活志一般清新的面貌；另一方面，这两部小说都以普通人的视角写普通人生活中重要却习焉不察的经验：生死与共的恋情、相濡以沫的日常以及小家庭充满亮亮力的奋斗史。一般而言，这种和日常生活无间的沉浸式视角，可能会让习惯了“家庭内部悲剧史”的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他们习惯了表现社会化、人性欲念对传统伦理亲情的破坏这类“更真实”的主题。当爱成为主题，自然而然，这部分读者会困惑，甚至视其若仇。

但是，若把“爱”视为《美顺与长生》小说叙事逻辑的起点，人物的行为与故事走向就会自然、合理、自洽。如果爱赋予生活意义，现实的人生是否会变得容易？因为爱，被父母和姐姐嫌弃的“傻子”长生，在姥姥的关心下健康成长，学得生存技能；因为爱，长生每月偷偷寄钱给美顺的亲人，为了美顺不受欺负，对抗自己的天然懦弱与恶棍争斗；因为爱，美顺在房产被长生姐姐莉莉偷卖之后，选择原谅，只为了长生“做一辈子姐弟”的简单心愿；因为爱，美顺从送报到开饼店，凭双手撑起小家庭，也使长生从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丈夫和父亲。长生喊着美顺“小媳妇儿”从

少年直至中年，相濡以沫。对爱有信心，美顺与长生的故事才会这样被写出来。也许，《美顺与长生》本可以有多种叙事走向，却因为爱成就了现在的面貌。“美顺”之名，合于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女性的想象。美顺或许是美的，当年栓柱在山上看到清晨雾霭中放羊的她，便不辞辛苦想要娶她为妻，但美顺很难说是“顺”的，就像婆婆说的“你就是控”。开水房的恶棍以欺负长生为乐，美顺为长生的尊严去拼命；失业之后，她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尝试各种谋生手段，从不畏难。美顺身上自然有“旧”，无原则地支持娘家哥哥，忍耐让人不免觉得她缺乏“新”的自觉。但另一个方面来说，小说中的另一女性形象——长生的姐姐长莉所代表的“新”，就什么理想吗？长莉受过良好教育，却冷淡智力低下的弟弟，对照顾生病的母亲充满负面情绪，甚至为一己之私骗卖弟弟房产。小说以人物的对照隐伏臧否，“旧”可能意味的奉献牺牲，“新”可能意味的自私冷漠，哪一种更宜家宜族，是家之为家的基石？这是一个家庭剧变的时代，个人欲求和传统伦理的矛盾愈演愈烈，新的家庭结构和家族关系尚在雾霭中。小说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家扩张到更大的世界，是一个流动和变化的中国：京郊的土地征用引发的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存方式的变化，东北山村的经济结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迁徙和就业选择，北京落户政策和新老北京人的构成……美顺与长生不可能做一个避世者，流动不居的世界何以安家？

小说提供的答案则是回到家的基点，提出爱的觉悟。如此，美顺又何尝不是新的？她帮助受前夫欺辱的师傅脱离苦厄，重新生活；她鼓励被栓柱抛弃的英子自立自强。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以自尊自爱赢得尊重，终于从一个在小区迷路找不到家的乡下小媳妇，成为家人依赖信任的女主人。这是爱赋予了美顺与长生的生命以意义，这也是《美顺与长生》最真实璀璨的核心。

◎编辑推荐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译林出版社出版

樊锦诗生于1938年7月，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1963年7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毕业，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半个多世纪，樊锦诗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在她的带领下，经过近30年不断实践，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先后上线的中英文版本的“敦煌数字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象的全球共享。

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执笔，按时间顺序而作，从樊锦诗出生、求学、实习，一直写到莫高窟的保护和传承。书中除了随文的黑白照片外，另附16页彩插，尽显敦煌之美。所有图片由作者及敦煌研究院提供，部分图片为首次公布。

◎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陈谦： 何处突围的镜像人生

汤 倩



在北美华文作家中，陈谦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早年从广西南宁赴美留学，以“啸尘”为笔名起步于海外中文网络刊物《华夏文摘》和文化论坛“国风”，自《收获》崭露头角以后逐渐转向线下发表。陈谦的独特性在于，在一众新移民作家中，她的写作从一开始就直接跨越了夹缝人生中生存层面的艰难，也超越了移民书写中种种关于身份确认、文化认同等离散经验再现的惯常路径。她不大关注边缘和中心、本土与海外、自我与他者等这些新移民文学中二元对立的传统话题，而是以平等对视的角度叩问异质文化冲突之外的自我建构和精神探索，直面人类生存的深层困境以及为了突破困境所付出的努力，从面向“what”转而追问“why”，以一种内向性的自省精神追求自我实现是其作品的特质。

作为一位曾长期从事芯片设计工作的硅谷工程师，陈谦掠过生存困境表现出思考的厚重，“以深刻展示旅美华人中高科技人员的感情缺憾和心灵悲剧独树一帜”（曾镇南语）。陈谦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为出入职场的硅谷精英、白领女性，作品往往表现她们努力突破家庭和社会（而非性别和族裔）的双重困境、追寻女性独立生存价值的心路历程，常常被纳入女性文学的研究范畴。但陈谦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视角，而是以此为视点，将自我与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经验相勾连，超越物质层面指向灵魂深处终极意义的追寻和拷问。正因如此，陈谦的小说大多不在情节跌宕处过度着力，散发出浓郁的心灵哲学气息。

《望断南飞雁》是陈谦较早知名的一部中篇小说，主人公南雁以“陪读太太”的身份携一子一女随同身为美国名校教授的丈夫沛宁赴美，相夫教子，岁月静好。她虽天赋平庸却始终难忘内心封存已久的设计师梦想，不愿沦为丈夫的附庸。但南雁的这种追求并不能得到沛宁的理解，最终她不惜冲破社会属性上“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桎梏，离家出走，逐梦而去。南雁因其“以血肉之躯撞开了日常生活之下女性困境的坚冰”（邵燕君语）而被视为新移民版本的“出走的娜拉”，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光彩夺目的华人女性形象。

长篇处女作《爱在无爱的硅谷》关注的是硅谷女工程师苏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困境。男友利飞代表的是那种无节制追求物欲的人生模式，而画家王夏代表的似乎是苏菊一直渴慕的“灵性”生活。厌倦了硅谷的苏菊追随王夏来到新墨西哥州沙漠，营造画室、放逐江河，然而生活似乎并不如之前想象的美好。是重回硅谷还是远走他乡，苏菊在两难中踌躇，迷失在精神需要与物质追求的摇摆不定中。《无穷镜》是陈谦时隔多年之后重回硅谷书写的长篇力作。女主人公珊映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是红珊科技CEO，对她而言，追求物质还是精神早已不必纠结。今日的硅谷人不同往日，单纯追逐财富不再是唯一目的。他们是一群对创业和创新抱着宗教般虔诚的新硅谷人，充满激情、不断创新，以科技革命改变人类生活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意义所在，也是他们眼中时代不断发展的核心精神。珊映的困境在于当她以短暂却耀眼的“烟花人生”为理想时，丈夫康丰选择的却是长久而安静的“线香人生”。为此珊映执著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永远攀登向上，康丰则在实现财务自由后急流勇退，当珊映因过度劳累以致腹中胎儿流产时，夫妻关系也走到了尽头。珊映和康丰类似于进阶版的南雁和沛宁。此外，陈谦还塑造了尼克、皮特、海伦、郭妍、安吉拉等组成的高科技精英群像，这源于“无穷镜”寓示的便是“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在这无穷镜像互相映照的复调人生，到底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是选择绚丽灿烂的烟花还是静美的一炷香？正如作者引用的诗歌《The Road Not Taken》所言，秋林中有两条道路，但我想不能两条都选。人们各有取舍互为镜像，彼此想象那条未经之路的风景，映照出内心最隐秘而真实的情感潮汐。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如同人生多元复杂的种种可能，归根结底凸显的其实是人物在精神困境中如何突破自我藩篱、拒绝庸常生活的努力。陈谦在小说中还关注了大数据时代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的改变，有关高科技环境下个人隐私的困境以及AI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伦理问题，是《无穷镜》在哲理性层面更进一步的反思与深掘。

陈谦的作品中还有一类值得注意。《蓬露》关注人们精神上的创伤和疼痛，以受创者的自救和拯救他人来唤起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疗救和治愈。《虎妹孟加拉》讲述的是玉叶黎黎孟加拉虎为宠物的故事，二代小留学生题材掩映之下的是现代社会人类情感和欲望抗争的精神困境。《哈蜜的废墟》更进一步在原生家庭、代际恩怨中不断追问关于宽恕和疗伤的内向性话题，在丰富的阐释空间中最终指向的仍然是女性如何挣脱精神束缚获得真实自我的探求之旅。

陈谦曾提到：“在好的技法之上，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和追问，应该是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她正是在这样的创作中一以贯之，致力于寻找困境中的突围之道，以小说为人生之镜像，既是警醒，也是收获。